



从“民工慌”到“民工荒”

——“后金融危机”时代对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反思

□ 杨 舸 孙 磊

摘 要：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历了从“民工慌”到“返乡潮”，又到“民工荒”，这些变化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刻原因？在全球经济正逐步走出阴霾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农民工”群体的定位。本文分析了农民工面临的就业困境和流动障碍，并深刻解析了我国的产业低端和农民工困境形成的恶性循环的关系。要走出这种恶性循环，必须从全局的视野看待农民工问题，实现经济增长和保障民生的双赢。

关键词：金融危机；民工荒；农民工

一、从“民工慌”到“民工荒”

2008年9月开始，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冲击下，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小企业司2008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1]，仅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进入下半年以来，一些大中型的加工企业也在倒闭的浪潮中被迫关门。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不可避免地成为承受直接冲击的群体。

1. 金融危机下的“民工慌”

企业倒闭潮引起了民工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2008年12月初完成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当年11月底，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十个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农民工返乡数总计有485万名，占2008年9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5.4%^[2]。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2008年11月中旬对广东、上海、江苏、福建和山东的调查显示，五省份企业裁员规模占本地企业从业人员的5.2%。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约有2000万农民工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3]。

2. 经济回暖后的“民工荒”

半年之后，“民工荒”卷土重来。2009年9月21日，《赢周刊》发表了《“民工荒”再袭珠三角》



的报道,指出:服装、玩具、制鞋、电子等大批制造企业在2009年下半年迎来了经济提前复苏的曙光,海外市场库存基本耗尽,集聚良久的需求正集中释放,短期订单纷至沓来,这让很多刚完成大规模裁员、没有充足劳动力的制造企业有些措手不及^[4]。

2009年9月21日,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也报道了一则新闻:“四川也现民工荒 建筑技术工月薪5000”。和逐渐回升的经济数据几乎同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在加剧。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2009年7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60.3万人,求职总人数35.4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深圳市4月用工缺口2.3万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四川招工也是困难重重^[5]。

事实上,从2004年年初开始,珠三角地区就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9月上旬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报道,沿海一些城市的用工需求和应聘比率为10.8:7,仅东莞就短缺民工70多万。2005年3月31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在中国就业促进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农民工短缺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的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6]。2006年,“民工荒”现象进一步蔓延,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同叫“缺工”。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进入下半年,在一些一贯是农民工输出地的内陆省份,也不同程度出现了“民工荒”现象^[7]。

3. 从“民工慌”到“民工荒”的反思

从“民工慌”到“民工荒”,这些变化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刻原因?在出现“民工荒”的时候,我们担心劳动力短缺,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失去最重要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金融危机使得农民工大量失业,出现了“返乡潮”,我们又担心农民工失业过多,影响社会稳定。

过去的种种担忧都体现了一种可怕的以经济数字为核心的精英价值观,“民工荒”和“返乡潮”的现象下面暗藏的是对农民工的蔑视,而所蔑视的正是保持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根本资源,这种蔑视不但不能保持经济的发展,反而会使得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化”的血液流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释放了出来,并呈现出巨大

的活力。直到今天,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这样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长期生活在城市的边缘,面临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长期以来,廉价的劳动力在经济学视角中被理解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对劳动力的蔑视没有被人关注和重视。提高经济指标不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而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如何能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呢?

所以,在全球经济正逐步走出阴霾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农民工”群体的定位。“民工慌”和“民工荒”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刻原因?

二、“民工慌”和“民工荒” 隐藏下的纠结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本文所指的农民工,是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务工就业的具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年龄为15-64岁。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关于“流动人口”有复杂的认定过程,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1. 农民工面临的就业困境

(1) 农民工签合同率低,难以依法保障自己的权利

尽管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均开展了为农民工维权的行动,但涉及农民工的侵权案件依然屡屡发生。只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才能有效地采用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但是,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就业身份是雇员的农民工中,64.5%的农民工雇员根本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只有35.5%的雇员签订了劳动合同。其中,签固定期限合同的占全部农民工雇员的33.06%,签长期合同的占2.44%。

(2) 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农民工一般工作时间长,劳动负担重。全国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54.65小时,一半的农民工每周工作56小时以上。如果按每周五个工作日计算,他们平均每天工作10.9个小时,如果按每日8小时工作制计算,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8天。数据还发现,有20.67%的农民工每周工作70小时以上,这可以说是超负荷的劳动。农民工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这严重侵犯了农民工的休息权,也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



(3) 农民工待遇较低,拖欠工资情况依然存在

我国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是比较低的。据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全国流动劳动力月收入的中位数为 800 元,这意味着有一半的流动劳动力月收入只有 800 元或不足 800 元。而且,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只有 890.58 元。

更为严重的是,拖欠工资现象依然存在。本世纪以来,政府一直关注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从 2003 年以来,尽管追讨工资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2006 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 1%流动人口调查”的结果显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已经有了较大改善,89.6%的流动劳动力能够按时领取工资。偶尔被拖欠工资的流动劳动力占 6.5%,经常被拖欠和一直被拖欠的比例分别占 2.5%和 1.4%。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以建筑工人、装修工人为主。确保农民工的工资能够得到正常支付,是农民工的一项基本权利,拖欠工资可能使得他们的生活失去最基本的保障。

2. 农民工的“流动障碍”

(1) 计划体制色彩的社会福利制度阻碍了农民工的自由流动

我国社会制度在许多方面依然带有明显的计划体制色彩,计划体制下的劳动力就业不适合劳动力自由流动,特别是计划色彩的社会福利制度提升了农民工的迁移成本和流入地的生存成本,形成了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

目前的社会福利体制造成了农民工许多问题。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依据我国的教育体制,儿童需要在其户籍所在地上学,否则就没有学校接受或需要缴纳昂贵的借读费。虽然教育部门已经出台保障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制度,对收取借读费等方面都有所限制,但不少地区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为了保护本地儿童的利益,依然对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念书设立了高门槛。依据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计算,14 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为 12.44%,规模达到 1833 万人,而城市能给外来儿童提供的福利是十分有限的。即便农民工子女能顺利在流入地上学,但目前的高考制度使得他们也必须回到原籍去参加高考,各地区教材和高考试题的差异使得他们无法在流入地的高中上学。

除了教育体制之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体制也带有明显的计划体制色彩。计划色彩意味着农民工只有回到户籍所在地才能享受到普通公民

能享受的福利。依据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计算,享有失业保险的农民工仅占 4.5%,享有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稍多一些,占 9.6%,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占 14.8%。农民工所能获得的社会福利是缺乏的,所有这些都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这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紧缺并存的主要原因。

(2) 劳动力市场还不能有效发挥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作用,农民工的就业渠道依然“非正规”

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如果能建立起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常规桥梁,便能够有效地减少人口流动的风险和成本,同时也能促进人口流动。政府或社会组织的正规劳务输出活动或机构正是承担了这样的角色。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不能通过正规渠道找到工作,那么他们的就业空间就极为有限,加剧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2006 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 1%流动人口调查”的结果显示,“自力更生”和同乡亲友介绍是农民工实现就业的主要方式。调查结果显示,21.8%的人自己做买卖,27.2%的人自己直接上门找工作。还有(44.8%)的农民工通过“别人”介绍而实现就业。依靠“用工单位招工”和“职业介绍所”等“正式渠道”和报纸、电视等“现代渠道”实现就业者极其有限。

农民工的就业渠道的“非正规”,只是其非正规就业的一个开端,伴随着的是农民工就业的劳动关系非正规,大多数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事实上,大多数人对于产生正规劳动关系的法律程序的了解是缺乏的。小雇主、小私营企业老板往往抓住农民工的这一弱点,不履行常规的雇佣程序,侵害劳动者的权益。

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就不能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使得劳动力市场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3) 农民工“向上”的职业流动机会比较有限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农民工的流动分为两种:一种是横向的流动,即在地域上的流动;另一种是纵向的流动,即其所属社会阶层的变化。社会阶层是按照社会中的每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来划分的,它通常表现在职业的差别上。有向上流动的途径,这是保持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然而,2006 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 1%流动人口调查”的结果显示,进城以后,北京流动劳动力职业身份继续“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了。这和农民工自身的因素有关,也是社会不



公平因素的集中体现。如：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户籍制度的不公平等等。

3. 产业低端和农民工困境之间的恶性循环

(1) 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导致了大范围的农民工失业

全球金融危机的来临，受打击最大的是我国沿海的外向型的制造业。这些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低端，面对风险时规避空间狭小。同时，大部分集群在内部产业链上分布不合理，产业集群内产品同质性程度高，且“两头在外”，使集群发展缺乏主导权，受外部环境影响大^[8]。而在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中，往往多是雇佣低价的农民工劳动力，农民工成为金融危机之后失业最快和失业最多的群体。原因何在？

首先，制造业是吸收农民工最多的行业。2005年，在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46.57%。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也吸纳15.32%的农民工。此外，还有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也是吸纳农民工较多的行业。

沿海地区吸纳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更高。2005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71.55%的农民工在制造业就业，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吸收了55.43%的当地农民工。除此以外，与制造业生产有关的产业链条也促使一些相关的行业也吸纳了不少农民工，如产品销售相关的行业（批发和零售业）和产品物流相关的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分别有12.66%和10.01%的农民工从事批发和零售业，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占3.63%和2.23%。

其次，制造业在我国出口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从2006年开始出口金额大于进口，制造业的出口额已占到全国贸易总额将近42%，进口额占40%^[9]。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国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持续降低。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由2008年8月的14.2%下降至2009年8月的12.7%。同时，欧洲市场也显示出需求疲软。而且，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元疲软和人民币升值，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的价格优势被严重削弱，出口进一步受到抑制。

原本受研发能力弱、管理粗放、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我国制造业已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压力。加上我国的制造业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强烈冲击，特别是以吸收农民工就

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主营收入和销售利润明显减少，融资与还贷能力不足，最后只能走向破产。

上文可知，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半数以上在制造业就业。又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足和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等特点，农民工特别集中在制造业中的抵御风险能力差、融资能力差、利润低的中小企业就业。因此，农民工成为此次金融危机后我国的第一批失业人口。

(2) 产业结构的低端化决定企业能提供的农民工工资水平低

目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的比较低的。分地区来看，在农民工主要分布的北京、上海、广东等省份中，农民工的月收入远低于当地的城镇居民。2005年1%人口抽样的调查的数据可知，北京市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080元，但北京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则达到了2156元，是农民工的两倍；上海和广东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分别为1117元和992元，而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分别为2053元和1682元，也是农民工的将近两倍。分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从事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中，农民工的工资大致都在800-1200元左右。在农民工较多的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910元，中位数为800元。

工资水平低是农民工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得到的农民工中有20.6%正打算更换工作，当问到他们更换工作的原因时，被摆在第一位的原因是挣钱太少，54.42%的打算更换工作单位的人都因为挣钱太少而更换工作，10.77%的人是因为“工作又苦又累”而更换工作。其他原因都被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

为什么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得不到提高呢？

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来说，劳动力的供给和劳动力的价格是出于平衡状态下的，如果出现劳动力短缺，要想达到新的平衡企业就会提高工资。但为什么农民工的工资始终得不到提高呢？这并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太严重，而是因为我国的制造业企业长期处于产业链条的最低端，简单加工出口，低技术门槛，利润空间十分有限，给农民工加工资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使企业无以为继。例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比重大。如果工资水平再上涨，势必会极大提高企业成本。

所以，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产业链条的底端，有限的利润空间也限制了农民工的工资提高，产



业结构低端化造成了农民工就业的“低水潭”和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企业产业链的低端化和农民工的低收入之间存在着恶性循环。

(3) 产业低端使得农民工“技工”的培训落后于需求

大多数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技能。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对于熟练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多,沿海地区的“技工荒”说明我国的一些企业对熟练工人或技工的需求大大高于其供给。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对于企业和农民工都至关重要。

然而,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的结果显示,71.8%的北京市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只有不到30%的劳动力接受过培训。培训本身对于农民工和用人单位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事情,可为什么农民工培训备受关注,却又始终无法有效开展?

中国企业缺乏核心的制造技术,在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价值环节不具有竞争优势,却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很多企业在国际分工环境中选择了生产加工和装配等环节,通过低端代工方式获得微薄的加工利润。这样就不用花力气去培训“技工”了,企业缺乏对员工进行技术性培训的动力。可一旦企业扩张和技术发展需要技术型工人时,技术人才的储备不足的问题立刻暴露出来了。“技工”不足又进一步使得企业陷入低技术、低利润的深洼。

所以,企业的产业低端使得企业没有能力和动力去培训农民工,“技工”不足又使得企业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4) 半“城市化”的农民工加重了内需不足

依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的城镇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达到44.94%,如果依据这个结果分析,我国的城市化速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但许多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城市化不是彻底的城镇化,而是一种“半城市化”的状态。

那么,什么是“半城市化”?王春光就指出,按博拉尼的看法,城市化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相互嵌入。城市化包含三层涵义:一是体系层面的整合,即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及制度体系四者相互衔接,而不是脱节的,农村流动人口仅仅从经济体系上被接纳,其他体系却受到排斥,不能说实现了城市化;二是社会层面的整合,即农村流动人口在行动、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存在明显

的区隔;三是从心理上认同于城市社会,对城市有着归属感(Nils Mortensen, 1999)^[10]。由此观之,“半城市化”是指农民工虽然进城务工,居住在城市,但是农民工并没有真实地“嵌入”到城市的社会、制度和体系,不但生活上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在心理上也对城市没有归属感。金融危机后的“返乡潮”就是农民工半城市化状态的体现。

那么,“半城市化”和“内需不足”是什么关系呢?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外部需求减少,政府寄希望于国内的消费市场,但相对于过剩的产能来说,我国消费增长缓慢。有专家指出,消费不振主要是因为农村拖了后腿。仅以2007年为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县以下零售额仅14146.3亿元。广大的农村地区仅为城市消费的1/4左右,而农村人口却是城镇人口的1.23倍,经济走势突破的关键在于对内需的拉动,而实现内需拉动的关键是农村市场的启动^[11]。

但振兴农村消费市场谈何容易,农民的消费能力差有其经济的和文化的深刻原因。一旦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并愿意在城市长期定居下来,消费能力和水平就能大幅度提高。2007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4.94%,但统计的城镇人口中包含1.37亿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农民工,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化率的增长对于促进消费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农民工完全融入城镇社会,他们才可能放心地去消费。不少调查证实,农民工把自己大部分收入都存起来寄回老家,不在城市中消费。

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和半“城市化”的问题走向了殊途同归的结局。金融危机后,我国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国内的消费市场,减少外部依赖性,这样才能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扩大内需也同样需要提高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这就需要为农民工创造更加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工作环境,同时从社会政策层面提供更多生活上的保障,促进农民工的彻底城镇化。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对策建议

1. 从全局的视野看待农民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业部门带来的人口流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也是决定我国能否顺利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能否转变成经济强国的重大人口迁移。从“民工荒”



和“民工慌”的演变过程可知，农民工问题不再只是一个民生问题，不再只是一个关系农民工群体自身的问题。农民工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构成我国实体经济体系的人力资源基础，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将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应该片面地、短浅地看待农民工问题，农民工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应该把农民工问题放在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角度加以重视。

2. 保障农民工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建立健康完善的劳动力市场

2008年，我国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对于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持有异议，认为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这种说法是不懂市场经济规律的说法。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会无视劳动者的权益，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在优胜劣汰的规则下，连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都无法保障的小企业本来就应该淘汰，虽然短期内也许会出现地方政府税收减少等后果，但保留它们只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竞争不公平，是缺乏远见的做法。

金融危机后，我国不但不能放松打击对劳动者权益的侵害行为，而且应该坚决地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抓住企业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的机会，保障农民工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建立健康完善的劳动力市场。

3. 扫除农民工的流动障碍，建立城乡统筹的社

会福利体制

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都曾出现过类似的农民工困境，从农村迁来的人口劳动技能差，收入低，生存条件差，在生活方式和习惯上不能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相融合。但是，像我国这样存在着体制隔离问题的却不多见。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变革虽然早已开展，却频繁受挫，如：户籍制度改革酝酿了10年之久，由于牵涉到地方利益、群体利益的调整，迟迟不能出台。一些省市在短暂时取消暂住证后又恢复了这项制度^[12]。但不论制度整合的难度有多大，只有扫除农民工的流动障碍，建立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城乡统筹的社会福利体制，才能消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才能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4. 实现经济增长和保障民生的双赢

“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和“保障民生”之间不但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相促进和互相依赖的，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要建立在保障民生的基础上，而保障民生也依赖于经济的稳步增长。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就要实现经济增长和保障民生的双赢。■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8XG035）]

杨舸、孙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博士
责任编辑 / 方奕

参考文献：

- [1] 发改委. 国家拟建中小企业银行. http://finance.financeun.com/news/200884/0917133072_0.shtml.
- [2]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 2008, 12.
- [3] 陈锡文. 中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 <http://news.21cn.com/domestic/difang/2009/02/02/5812552.shtml>.
- [4] 经济回暖民工荒再袭珠三角 产业升级被迫提速. <http://news.hexun.com/2009-09-23/121180107.html>.
- [5] 四川也现民工荒 建筑技术工月薪5000.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90921/21596776311.shtml>.
- [6] 包小忠. 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J]. 经济学家, 2005(4): 55-60.
- [7] 杨新. “民工潮”与“民工荒”的经济学分析[J].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4).
- [8] 2009年01月08日南都网—南方都市报. <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090108/306337.shtml>.
- [9] 国际金融危机对行业影响 制造业10年内优势仍在. <http://info.jctrans.com/zhuanti/jrfb/20081023699344.shtml>.
- [10] 金达仁. 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http://cio.ccidnet.com/art/12129/20081124/1621573_1.html.
- [11]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6(5).
- [12] 黄枢梓. 内需不足最根本原因在农村[N]. 上海证券报, 2008年11月25日.
- [13] 丁建兵. 中国发展面临“半城市化”挑战[J]. 调研世界, 2008(1).